

柴可夫斯基,祖国不许你“出柜”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11月2日—11月8日)

本周,苹果总裁蒂姆·库克“出柜”的消息引得广大果粉很不淡定。有人戏言,库克“出柜”的决定,是他干的唯一一件比苹果上任掌门“乔帮主”更有创意的事情。不过,与今天牛人“出柜”被视为有魄力不同,倒回一百年以前,这种消息可是能要人命的。比如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最后就死在这事上。

柴可夫斯基死于1893年11月6日,再过几天刚好是他的忌日。说来有些匪夷所思,对于柴可夫斯基的真实死因和他的性取向,俄罗斯当做“国家机密”捂了一百

年。在这期间,沙俄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一直一口咬定他们这位“国家的骄傲”是因为喝生水染上霍乱而死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历史文件的解密,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恋倾向暴露而被逼死的内幕才被公开。

俄国人为什么对柴可夫斯基的性取向问题这么当回事呢?这得从沙皇的那点小心思说起。自古以来,但凡一个政权因合法性受到质疑撑不下去了,最后一招往往往标榜自己在道德上“高大上”,中国历史上篡汉的那个王莽,在被起义军弄死前,最后一项形象工程竟是搞天文观测,以彰显自己“受命于天”。同样的道理,19世纪的沙俄皇权,在被革命家们折腾得没辙的时候,唯一可说的只有自己“受命于上帝”,而在《圣经》中,“搞基”的索多玛城最后不是招致彗星撞地球了么(天

火),沙皇陛下揪住这一点,玩命地迫害同性恋。在当时的俄国,你如果公开“搞基”,上街是要戴“狗牌”的,以便路人鄙视和围观之用。

在这种大背景下,已经混成国宝级大音乐家的柴可夫斯基,当然清楚自己一旦“暴露”无异于是在打俄罗斯的脸,所以他一直小心地隐瞒着自己这个秘密。但巧的是,他的同性恋伙伴刚好是斯坦博克公爵的侄子,这位爵爷又是沙皇的至交好友。因此,爵爷在无意中得知柴可夫斯基“带坏”他宝贝侄子后勃然大怒,立刻写信向沙皇告了御状。

幸运的是(或者说更不幸的是),替公爵送信给沙皇的是一位名叫尼古拉·贾可宾的律师,这哥们儿刚好是柴可夫斯基的大学同学。在得知自己这位“睡在上铺的兄弟”原来是“基佬”后,贾可宾律师做了个在他看来大义凛然的决

定:为了不给母校、祖国和柴可夫斯基自己抹黑,他扣下了这封信,并在自己家中设了一个“荣誉法庭”,帮柴可夫斯基断了这桩丑闻。

由于柴可夫斯基和贾可宾的母校是圣彼得堡法学院,所以这个“荣誉法庭”召集的法官、律师和公诉人其实都是两人的同班同学,因此1893年的10月31日,当柴可夫斯基刚跨进“法院”大门时,很有些来开同学会的意思。但是这个“同学会”的决定却相当冷酷,包括柴可夫斯基在内的八位同学,在闭门商讨五个小时后作出判决:公爵的告发信将不被交给沙皇,但作为代价,柴可夫斯基必须自杀。

柴可夫斯基的自杀方式非常痛苦。为了让自杀看起来像是霍乱发作,从11月2日开始,柴可夫斯基便服用小剂量的砒霜,先是严重腹泻,然后急剧呕吐,这么折腾了四天,直到11月6日,一个曾经谱写出

无数动人旋律的大脑,终于在极度的痛苦中停止了思考。

柴可夫斯基之死,是一曲比其所有作品都更加凄婉的哀歌。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于,推动剧情发展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出于公心,在维护道德。然而,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会发现处死柴可夫斯基的那种道德其实是荒谬而可笑的,柴可夫斯基死得实在冤枉。

讲述这个故事,并非为同性恋翻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它的排斥与迫害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从中得到的应该是一种思考:直到今天,在我们的道德律中,依然存在大量类似“歧视同性恋”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的存在,柴可夫斯基的悲剧仍在我们周围不断上演着,那些今天看上去如贾可宾般义正辞严的“执法人”,正是众多悲剧的酿造者。



2014年3月26日,法国Bodet钟表公司的工人在拨动钟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在3月29日迎来夏令时,时间被往前拨快一个小时。 CFP供图

俄罗斯为何开始永久使用冬令时

夏令时:人与时间互相折腾

10月26日,俄罗斯正式停止使用夏令时,开始永久使用冬令时,全体俄罗斯人一边将钟表向后调整了一个小时,一边衷心地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折腾了。事实上,目前全球仍有一半国家每年会把时间来回拨两次,这就是所谓的夏令时。人类如此反复地折腾时间,本来是为了节约能源,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么干的结果,折腾的很可能是我们自己。

本报记者 王昱

起源: 一位美国先贤的建议

夏令时,英文名称为Day-light Saving Time(DST),直译“日光节约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即在夏季人为地将时间提前一小时,使人早起早睡。一般采用夏令时的国家会在冬天来临前将时间拨回去,因此冬天所用的标准时间,有时又被称为冬令时。

这种举国上下一起搞“自我欺骗”的神奇构想,起源于美国开国领袖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在独立战争中居功至伟——他时任美国驻法大使,为美国争取到了法国的援助。话说富兰克林在法国“乞师”时,曾捎带手干了件副业,他在1784年给《巴黎杂志》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说法国人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

浪费了大好的阳光。对此痛心疾首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早睡早起,信中还做了个简单的计算,说如果法国人愿意早睡一小时,每年可以节约6400万磅蜡烛。富兰克林算的这笔账,据说就是夏令时的最早雏形。

误解: 一种鲜为人知的本能

富兰克林对法国人“晚睡晚起”习惯的观察是正确的,不过,他的思考方向却值得商榷。聪明的富兰克林忽略了一点,在当时的法国,外省农民跟美国人一样是早睡早起的,只有巴黎的贵族老爷们才有熬夜的习惯。

翻翻人类的历史,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几乎都更倾向于在太阳下山后再吃喝玩乐。为什么人类一有闲就成了夜猫子呢?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为其找到了依据:人的思想活动分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具有逻辑性、功利性、现实性

和目的性,而无意识的活动都遵循着“唯乐”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在白天,人们要扮演社会角色,处于相对疲惫的状态;而到了夜晚,人们从社会角色转换到个体角色,能够完全按个人意志来支配自己的活动。因此,与白天工作更有效率一样,人类在晚上娱乐的“效率”是更高的。

法国贵族老爷们用生活实践总结出来的那套熬夜习惯,其实比富兰克林的理性建议更合理。

成形: 一次世界大战的助推

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法国人最终没理会富兰克林那一套,但这个省能源的主意就此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

1907年,英国建筑师威廉·维莱特正式向英国议会提出夏令时的方案,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成形的夏令时方案。维莱特

的这个建议,与英国当时所经历的“煤炭恐慌”有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英国浅层煤炭开采的枯竭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能源需求量激增,英国人对手头的煤炭还能支持多久产生了焦虑,所以全国上下开始想法子省能源,夏令时成为这些方案中的一个。不过,由于担心夏令时复杂的制度会给幅员广大的英帝国造成混乱,维莱特的方案最终被英国议会否决。

夏令时的真正实施,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1916年,一战中的德国为了节省被英法所封锁的能源,决定实施夏令时。获此消息后,英法在第一时间也决定使用夏令时。

曾经相继否决过夏令时议案的英国人、法国人,为何要在德国山寨自己后跟风呢?其实,英法的做法并非出于对夏令时本身的利弊权衡,而是基于博弈学的简单反应——英法在当时的一战中开始占据上风,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德国采用某种政策

并见到良好效果而英法不采用,那么英法将丧失刚刚到手的优势。反之,如果英法跟风而该政策最终证明作用不大,英法却不会损失优势。

这种“你动我也动”的博弈学反应,是助推夏令时步步推广、固化的原因之一。1917年,新生的苏联为了节约有限能源第一次实行了夏令时;冷战开始后,将苏联视为对手的美国于1966年正式立法确定永久使用夏令时(后废止);受此影响,苏联政府在1981年正式立法确定了夏令时。的确,在“能源为王”的20世纪,夏令时如果有益,很可能成为决定国家胜负天平的最后一根羽毛。但问题在于,它真的有益吗?

存废: 一场延续百年的纠结

表面上看,夏令时节省能源的效果显而易见:德国在1916年实行夏时制的当年,便节约了15%的煤气和电力,直接经济利益2亿马克。坚持采用夏令时的法国每年节省的燃料,可供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使用一年。

然而,相比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受益,夏令时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潜在而巨大的。本能地倾向于夜间娱乐的人们,往往不能在夏令时实施时早早入睡,而他们需要按着夏令时所规定的时间早起,其结果就是夏令时往往会造成不少人生物钟混乱、睡眠不足。

研究显示,夏令时会造心脏病的发病率上升,甚至自杀率大幅提高。我国曾在1986年至1991年实行夏时制,就在实施当年,广东省递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广州市区1986年7月份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比1985年7月份上升了36.7%,死亡人数上升了19%,主要原因竟是司机睡眠不足。

此外,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夏令时节省能源的优势其实也在消退。2006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开始在全州使用夏令时,通过比较2006年前后的能量消耗发现,夏令时反而让全州家庭住宅总共多使用了接近800万美金的电,究其原因,是因为如今家用能源的大头已经从照明变为空调。在炎炎夏日里,如果想逼着人们在暑气未消的傍晚早睡,空调的用电量当然会直线上升。截至2014年3月的研究表明,夏令时最多能帮助美国减少1%的用电量,美国国家标准局则认为夏令时用电量没有丝毫影响。

把时钟调快一小时,“骗”自己早睡早起,这个曾经被富兰克林寄予厚望的计划,如今日渐被证明是无用甚至有害的。这个计划之所以破产,归根结底是它小小地违反了一点人性——晚睡晚起是人们在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后所作的自由选择,想用“折腾时间”的方式把它改过来,最终折腾的其实是我们自己。